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司徒琳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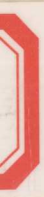
赵世瑜 译

赵世瑜、杜正贞 审校

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

上卷

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



K248.07
S703

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
上卷
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

【美】司徒琳 主编
赵世玲 译
赵世瑜、杜正贞 审校

- 60

K248.07

S703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edited by Lynn A. Struve
© 2005,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in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 (上卷), 从明到清
时间的重塑 / (美) 司徒琳主编.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2
(清史编译丛刊)
ISBN 978-7-108-03027-6

I. 世… II. 司… III. 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明清
时代 IV.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2414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6-198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字 数 273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

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

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两卷本前言

司徒琳 万志英

对时间的认识——在或稳定或变动的情况下人们如何经历时间，当我们思索过去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型塑”它——在历史学家（他们恰恰是以研究时间流逝为主业的专家）那里一直是令人难以理解地缺乏。到目前为止，关于时间和时限性（temporality）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完成的，而他们的研究着眼于西方文化。研究东亚的学者尽管已经对传统的时限性（temporal）观念和记时系统做出了详尽的研究，但他们几乎未能说明过去的人们是如何“通过生活而感受”时间的，也没能说明对时限的感知（temporal sensibility）与民间信仰、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此外，在这一研究中的漏洞在“微观层面”一直持续的同时，在“宏观层面”将东亚历史并入跨大陆时间的各种形态的需求日益增加——宏大的时间分野与多地区之动态视角——这一点在迅猛发展的世界史领域内已经浮现而出。

此两卷本合集名为《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其目的在于，对于一个在整个东亚产生了迅速而后果重大之变化的时期，通过采取所谓事涉结构的（emic）和不涉结构的（etic）观点，来满足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的需求：在17世纪和

18 世纪初发生了明朝的崩溃和清朝的建立与巩固等一系列事情的那个区域的核心，出现了崩解、变革和重建。这一时期的文献充足，可以以此详细地考察彼时之人——不仅是汉人，也包括满人、蒙古、朝鲜人和欧洲人，是如何被迫调整他们对其当下的用时和记时的手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对历史修正认识的基础上，在重新构想的模式下定位他们的当下的。同时，随着对东亚范围内明清变迁的认识，目前的学术状况使我们有可能质疑构成和塑造 17、18 世纪世界历史话语中的时间概念的某些回顾性方式——比如说它是一个“火药革命”的时代、一个民族国家萌发的时代，或一个“早期现代”帝国主义的时代等观念。

上卷《从明到清时间的重塑》对运用事涉结构的观点来解释东北亚次大陆支配权在明清之间的转移而引发的时限性变化。本卷中有 6 篇文章分散在三个部分中，均具有高度的创见性。第一部分“不断变动的满汉历史意识”揭示了在满人征服势头不断扩张之时他们对以往“征服王朝”历史的认识和解释是如何演化的；它也随着追述新降服的北方汉人绝望的探索，通过与中国以往历史中本土的主要王朝进行多重的、交叉的类比，去理解他们的处境。第二部分“民族征服与抵抗的时限性”考察了发生在朝鲜人中的礼仪之争和对时限符号的矛盾心情。在朝鲜时代最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后者内心里忠于明朝，而对他们的新的主子满清心怀敌意。它也揭示了反映在时限的表达上的微妙而深远的变化，即蒙古人在理解他们作为清朝统治伙伴的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时所经历的变化。第三部分“民间文化中的别样与历法时间的象征”向我们详细地展示了某些由于皈依基督教（因国家忙于其他地区而无暇顾及此处，这个地区的宗教文化得以更加开放）而需要生活在本土传统的和分明我礼拜式的历法中的中国人所做出的调

整。它调研了东南沿海地区一个奇特的民众实践，把一个特定的日期赋予了宗教的意义，以便在清的统治下秘密地永远怀念明朝。这样，本卷以具有吸引力的、丝丝入扣的研究，扩展了我们关于亚洲史上一个关键转折点的知识，但它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表明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于在普世时间体系中社会时间的动态关系——是如何可以加深我们对无论何地、不分古今的人类状况的理解。

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关于欧亚大陆上出现的清朝的新秩序，采取了不涉结构的时限观。这里的八篇论文首先探讨了“清的形成”可以被“定点”在 17、18 世纪欧亚大陆发展模型中的各种方式。特别是在与康熙朝本身的视角进行比较、又与目前对 17 世纪末内亚历史的非民族主义观点相比较的情况下，对康熙皇帝对蒙古领袖噶尔丹发动的战役所进行的现代民族主义解释所进行的批判。另一项研究以更广阔的时空视角审视内亚^①，认为清在这一地区巩固其统治之举动——完成于 18 世纪中叶——是内亚历史上的一个更为长期趋势“再帝国化”的结果，这一趋势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的割据状态百年之后的 1500 年前后就已显现出来。本部分中的第三篇文章提出了颇为重要但却奇怪地被人忽视的问题，即火器的新进步与明清冲突及清的胜利之间的关联，它详细地分析了东亚资料的一手证据和关于 16 至 18 世纪世界历史话语中的“激进”与“和缓”的“军事革命”理论之不同意涵。第 4 篇文章则转向沿海地区，比较了欧洲的与从明到清中国沿海省级规模的政治单元的不同命运（前者趋向成为独立的国家，后者如福建虽显示了独立的倾向，但很快就

① 原文 Inner Asia 或被译为“亚洲内陆”——译者。

被并入了中央集权的帝国秩序), 指出了欧洲与中国权力的这种差异之长远影响。

下卷第二部分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 清时期是否应该指为“早期现代”? 在四篇文章中, 有两篇的答案是相对肯定的, 其中一篇审视了经济成长、税收增加、版图巩固以及行政上的集权——把清代中国视为欧亚大陆几个以土地为基础的、具有“早期现代”特征的帝国之一例。另一篇采用了艺术史的方法论, 通过对“视镜”(lens) 之别出心裁的解释, 考察了清代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 发现早期现代之镜能最终提供了更多和更长期的益处。通常认为, 变迁的时限观是现代性的特征。下一篇文章比较了以上观点, 通过笔记文学分析了经历鼎革之人的时限感, 得出了颇为否定的结论, 对早期现代范式提出怀疑。另一篇文章以最为绝对的否定的姿态, 反对早期现代性存在于世界历史的任何地方的整个概念, 质疑了 17 和 18 世纪无论东西方的社会经济变化都具有划时代的性质。该文作者宁愿用“盛期”(rounds of efflorescence) 来看待那些变化, 这个盛期并不比历史上其他盛期意义更重大。他认为, 19 世纪现代性的突然显现是重要的, 但并没有任何长期的、“早期的”发展阶段在它前面发生。

如果放在一起看, 这两卷书提供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所谓明末清初时期(以王朝史角度而言) 主流时限模式之外的其他选择。30 年来, 西方的中国史学者把这一时期定位于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晚期”, 它从 16 世纪中叶始, 直到 20 世纪初。晚期帝国范式被构想为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对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定义之反动, 后者认为那时的中国陷于一个循环往复的“王朝周期”, 这个周期再生产了一个本质上充满惰性的“传统”社会,

直到中国完全暴露于由西方世界发起的现代化力量之下。与之相对，晚期帝国框架试图确认和评估明朝的最后 100 年开始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本土模型，这些模型不仅给整个清时期、而且也给后帝制现代世界的国家与社会赋予了独特的形与神。尽管晚期帝国模式主张中国社会变化的自发性，但它也把这些变化背后的动力置于市场经济成长之中，后者动摇了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等级结构，激发了独立性从严格的行为与表达的规范中挣脱出来。这样，它在商业与文化之间建立起联系，这基本上是重申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观念。明清时期的晚期帝国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时代，与以前的王朝周期截然不同，这种观念提供了一个从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动力来审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过程的语境，用柯文的话说，创造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的机会。

但与此同时，晚期帝国模式趋向于把中国的发展与更广阔的亚洲史及世界史背景隔离开来。最近强调清帝国独特满洲精神的学术浪潮重申了清的独特性，但它是在更广阔的中部欧亚草原的政治遗产和演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通过与明朝的自我强化的文化本土观及孤立主义相对照，把清描绘成一个有着多族群意识的殖民帝国，学者们确认了清的确切王朝特征，而同时否认了清朝是一个“汉化”的过程，异族统治者同化于中华文明规范的过程。此外，正如本卷的论文所显示的，最强烈地把清的独特性强调为一种满洲体系的学者们，同样也最可能把清的形成与“早期现代”的概念联系起来，后者凸显了整个欧亚大陆政治与文化整合的类似（在某种程度上互补）的模式。以此观点，理解清的国家与社会的主要框架是早期现代世界的共时性演进，而不是中华帝国晚期或王朝中国的历时性尺度。

与如今历史学家试图把清与其世界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普世化视野形成对照，这两卷中的其它文章从历史主体的特定化视野考察了明清的变迁。对于经历了王朝更替的那些人来说，清的来临毕竟意味着一个调适、稳定和重新建立秩序的过程，这把先前明的臣民带进了清帝国事业的掌控之中。对他们来说，王朝的变化引发了一场势不可挡的信仰危机，导致了对个人命运和文明运数的强烈心灵寻求，这种心境，在一个世纪以后，这些人的子孙对此就很难理解了。清的汉人臣民通过援引以前时代无序的先例，通过将其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汉人适应异族统治的混合观念，拼命使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断裂合理化，因此他们的个人时间和历史观念就加入到在经典史书中记载的文明进步与倒退的长时段之中去了。

这样，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把从明到清安置在历史时间中的新形式就与晚期帝国范式不同了，它们更强调清形成的独特性质。中国以前的历史经验在这些结构调整中主要成为意识形态的陪衬，在调适的过程中用来洗涤亡明的记忆或证明其灭亡的正当，并赋予新秩序以合法性。在与新近强调清的满洲特性保持一致的过程中，与明（更不要说再早期的中国史）的历史连续性被极大地抛弃了，以此来迎合历史的偶然性和全球的变化。

关于清的形成是否如濮德培所主张的，标志着早期现代世界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读者们无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一论点的优点在于对早期现代性观念的重新解释，不再假定欧洲的首要性。这样，把清的形成包含在早期现代的分析框架中的事例，就放诸于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全球互动之中，使之成为和奥斯曼、莫卧尔、俄罗斯“火药帝国”同类型国家，放弃了欧洲的海上交易和显示了“原生资本主义”特征的市场经济的成长之特

征。但把早期现代性与欧洲的现代性分离开来也就剥夺了现代性的任何分析性用途，自然早期现代性也就没有意义。也许争论较小的是乔迅的看法，他认为，使用早期现代性的叙事不需要否定晚期帝国或其它给清朝分期的其他范式。正如乔迅建议的，需要一种带有多多样性的叙事学之镜来充分捕捉伴随着明清变迁的同时出现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在这些文章中同样明显的是历史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上的空间差异——这是不可能在任何单一的、同质的表达方式之内解决汉语世界巨大差异性的另一个标记。

有一种声音并没有出现在这些论文中，那就是从历史中的先例来看待清的视角。从作为整体的中国史的背景中观察，清的形成无论多么独特，它似乎并未造成对中国历史的根本背离。中国的历史学家经常把异族统治的时期——最明显的是在汉唐之间的中断期和 13 至 14 世纪的蒙古统治时期——看作是中国历史进化模式中的异常或背离。蒙元导致了中国历史正常轨道的断裂这种观念（一律伴随着消极的后果），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史乐民与万志英编，2003 年）一书中受到挑战。正如史学家正确地批判清的故事是异族统治者成功汉化的观念一样，我们也应该把元的历史是汉化失败之历史的陈词滥调抛弃。蒙古统治的时代逐渐在流产的宋朝“早期现代性”叙事中和在最近西方世界史学界“西方的兴起”叙事中，均占据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但是对于赋予蒙古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全部的重要性来说，他们的历史角色还是在于把蒙古人丑化为不可同化的异族。更恰当的观点是，当蒙古人在元代中国的统治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场景、而后者又以意义深远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与文化生活时，也存在着把元与宋连接起来的关键的连续性。的确，明朝的建立比元朝的征服可能在中国历史上标志着一

个更重要的起点。然而，把元代同时整合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之中的工作还远未完成。本书中的论文所提供的丰富见识不仅加深和拓宽了我们对东亚时间和世界历史时间中明清变迁的认识，它们也提醒我们需要去重新考察整个中国历史的模式。

致 谢

VIII

本卷中的各章来自 1999 年 6 月在印地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召开的“世界史与中国史时段中的清代形成”会议。那次会议得到印地安纳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财政与行政方面的支持，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当时的中心主任乔治·威尔逊（George M. Wilson）教授、当时的副主任杰森·刘易斯（Jason Lewis）博士，和至今在任的行政主管本妮塔·布朗·班宁（Benita Brown Banning）。在许多方面给予帮助的还有起草会议报告的阿瑟·凌（Arthur Ling），提供支持的还有印地安纳大学国际项目办公室和某些自费前来的与会者。

为本卷出版提供经费支持的是印地安纳大学科研办公室、研究生院和东亚研究中心。约翰·霍灵斯沃思（John Hollingsworth）尽管已从印地安纳大学地理系退休，但他还是继续满足了我对专业制作的地图的需要。对于本项目来说不可或缺的多种文字处理的技术是宏相尾田博士和瓦妮萨·诺兰（Vanessa Nolan）提供的，对他们永不消退的耐心、强判断力、合作精神和技术能力，我要致以深深的谢意。印地安纳大学欧亚大陆中部研究系的同事们，特别是艾略特·斯珀令（Elliot Sperling）教授

和克里斯托弗·阿特伍德（Christopher Atwood）教授积极与会，而且参与编辑有关西藏和蒙古的材料。当然编辑上的错误依然存在，这完全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

我还要向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帕翠莎·克劳斯比（Patricia Crosby）以及《亚洲交流与比较丛书》的编委们表示感谢，特别是主编乔舒亚·福格尔（Joshua Fogel）和匿名审稿人在接受和出版本书方面的支持。

啊，当然还有小黄啦！她认真地履行着猫的“监督”之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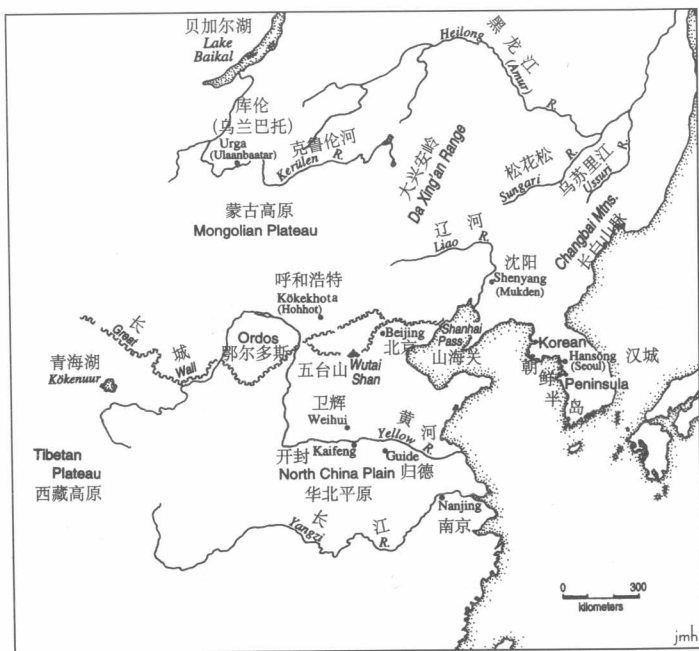


图1 明清时代的东北亚